

日本治臺經驗取鑑： 戰前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之分析(1911-1933)^{*}

林文凱^{**}

摘要

本文以戰前(1911-1933)福建官方對於臺灣的一系列經建調查與教育考察活動為分析主題，討論當時福建與臺灣互動關係中的一些重要課題。首先檢討學界有關這一主題的研究現況，指出除忽略不少重要的調查與考察活動外，同時亦因僅關注調查活動本身，忽略了調查活動所以發生的幾個重要脈絡——包括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福建本身省政進展、以及臺灣籍民(紳商)的中介角色，以致無法適當闡釋這些交流活動的過程與意義。其次，利用新的研究框架，重新分析閩浙總督松壽主政時施景琛的考察(1911)，以及福建巡按使許世英主政時程家穎(1915)、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師生(1915)、汪洋(1916)、張遵旭(1916)等人的考察活動，並討論學界過去忽略的一系列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透過這些分析，一方面強調福建官方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並非僅是福建省政官員所主動展開，實際上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與福州廈門的臺灣關係者(臺灣籍民)，也扮演重要的推動助力；另一方面，亦闡明這些考察活動背後同床異夢與相互為用關係，指出福建官方深知總督府的臺灣經驗推銷包藏南進侵略禍心，但仍從省政近代化的角度，積極來臺考察學習日本治臺經驗與學知。

關鍵詞：臺灣南進政策、福建省政近代化、經建調查、教育考察、學知交流

^{*} 本文係筆者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臺灣與福建關係：日治時期臺灣與福建之間經濟與農業調查學知的交流(1895-1937)」(MOST 106-2410-H-001-079)之成果。本文部分內容曾發表於2017年11月28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週二演講活動，非常感謝與談人林滿紅教授與臺史所研究同仁許雪姬教授與鍾淑敏教授等所提示的寶貴意見。本刊兩位匿名審稿人也提供深入的修改意見，謹此致謝。但文責仍應自負。

收稿日期：2017年8月17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11月13日。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 言

長期以來，臺灣與福建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十七世紀中期開始，陸續有大量閩南移民來臺拓墾、定居，成為臺灣的主要住民，兩地間也建立起密切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交流。清代以來，直到 1886 年臺灣建省之前，臺灣一直是福建省的一部分，政治與軍事上都受到福建的密切控制。而在經濟交流上，臺灣與福建之間也構成緊密的市場圈，開港前臺灣主要輸出米、糖等農產品到福建沿海港口與華北等地，並經由福建港口輸入福建與江南地區的手工業商品；開港後，除了米、糖外，臺灣還增加了茶、樟腦與煤礦等重要輸出品，市場圈並擴展到世界各地。但福建的廈門與福州等港口，仍與臺灣有著最緊密的交流。清代臺灣的漢人文化，很大部分源自於福建地區的原鄉，並長期與其保持密切的社會文化交流。¹

但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臺灣被割讓給日本成為其殖民地，臺灣與福建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關係因此有了很大的變化。日本帝國一方面希望切斷臺灣與祖國華南地區的聯繫，因此透過各種政策限制臺灣與福建的人民與文化的互動；另一方面又希望臺灣成為日本南進的基地，藉以強化其對於華南，尤其是福建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影響力，因此也透過各種南進政策加強臺灣與福建之間的交流。尤其在後藤新平主政（1898-1906）之後，臺灣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顯著，財政收入大增，臺灣總督府開始投入大量財政資源，強化針對華南尤其福建等地的南進政策；同時，晚清新政期間，日本學知的學習風潮與日本治臺成功的改革經驗，也開始吸引有心改革福建省政官員們的關注。臺灣與福建的關係，原本到清末為止係臺灣向福建汲取政經文化，現在轉為福建向臺灣借鑑政經發展經驗。

¹ 施懿琳等著，《臺閩文化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

依據日本南進政策研究先驅中村孝志的研究，日本帝國以臺灣為中心的華南與南洋攻略經營政策可分成四期：

第一期是領臺到 1914 年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搖籃期：臺灣總督府在 1900 年清朝八國聯軍之亂期間發動廈門事件失敗後，放棄武力經略福建，轉而主要著眼於華南的文化工作，並且規劃臺灣與華南的貿易擴張計畫。

第二期是從 1916 到 1923 年關東大震災為止的積極南進時期：這個時期臺灣總督府積極策動南進，除編列南支南洋施設費與航海補助費等大量經費，同時也擴張新設各種華南與南洋的經濟與文化事業，希望擴大日本在華南與南洋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力。

第三期是從 1924 年到中日戰爭爆發前的 1936 年為止的南進政策停滯期：此時期日本本國經濟不景氣，臺灣總督府本身也受連帶影響，削減了有關南進事業各項推動經費與機構。但此時期也透過前期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的南方調查事業，以及臺灣高等商業學校、臺北帝國大學等研究教育體制的創設，培育了不少南方調查研究人才。

第四期是 1938 年到二戰結束為止的軍事南侵時期：臺灣前期所培養的南方調查研究人才，大量被應用在華南與南洋的情報調查中，並協助規劃日本帝國在華南與南洋佔領區的各種戰地政策。²

臺灣總督府的南進政策，不僅在政策規劃與執行過程中生產了大量有關華南與南洋的調查資料，同時在南進政策的推動過程中，許多福州與廈門等地的臺灣籍民（因故在中國居留的臺灣人與特殊方式取得臺灣籍身分的中國人）也扮演重要的角色。關於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的調查活動與臺灣籍民問題，除了前述中村孝志之外，日本、臺灣與中國學界都有不少的研究成果。³不過大部

² 中村孝志，〈台灣と「南支・南洋」〉，收入氏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頁 5-6。

³ 如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板橋：稻鄉出版社，2002）。梁華璜，《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同作者，《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4）；同作者，《梁華璜教授台灣史論文集》（板橋：稻鄉出版社，2007），頁 145-241。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鍾

分南進政策的研究，因為既有議題設定的緣故，並沒有同時從福建方面的角度考察其與臺灣互動關係的變化，尤其是不同時期福建方面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本文想要介紹這些與南進政策有關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以擴展有關南進政策的研究討論範圍。

筆者發現，福建方面的臺灣調查活動與其不同時期的省政演變有關聯，約略可分成四期：

第一期是 1895-1911 年間：首先，閩浙總督許應騷（1898-1903）主政時，曾在開始推行新政的清廷支持下，支持臺灣總督府提出的礦山開採案與福建官腦局案，儘管合作案中途夭折並未成功；⁴其後，晚清末任閩浙總督松壽（1907-1911）主政時，則在清末積極推展新政改革下，派遣福建中等工業學堂監督施景琛前來臺灣考察，期望借鑑臺灣經驗與力量合作發展福建的近代化實業。⁵但兩人之間的其他 8 任總督任期都極短，無力推動省政的變革，與臺灣的政策互動較少。

淑敏，〈日治時期台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北：臺灣東華書局，2004），頁 399-452。原覺天，〈總論篇 第 2 章 「南進」とアジア研究〉，《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滿鉄調査部・東亜研究所・IPR 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84），頁 15-62。鍾淑敏，〈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之研究——以情報體系為中心〉，收入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下冊，頁 695-733；同作者，〈明治末期台灣總督府の対岸経営：「三五公司」の福建樟腦專売問題を中心に〉，《台灣史研究》（大阪），號 14（1997 年 10 月），頁 32-42；同作者，〈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期 34（2004 年 12 月），頁 149-194。橫井香織，〈柳生一義と台湾銀行の「南支南洋」調査〉，《東洋史訪》，號 11（2005 年 3 月），頁 35-47；同作者，〈台湾銀行のアジア調査と營業拡大：明治後期から大正初期を中心に〉，《現代台湾研究》，號 37（2010 年 3 月），頁 26-46；同作者，〈日本統治期の台湾におけるアジア調査——台湾總督官房調査課『南支那及南洋調査』の分析を中心に〉，《東アジア近代史》，號 11（2008 年 6 月），頁 34-66。

⁴ 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頁 43-69。鍾淑敏，〈明治末期台灣總督府の対岸経営：「三五公司」の福建樟腦專売問題を中心に〉，《台灣史研究》，號 14，頁 32-42。

⁵ 這是戰前福建官方第一次經建學臺灣的考察活動，參見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119-121。

第二期是 1912-1926 年間：辛亥革命以來，隨著中央政權的混亂與各地軍閥的爭權，影響了福建省政的穩定性。這段期間福建軍權陸續掌握在李厚基等人手中，並有名宦許世英（1914-1916）擔任巡按使。⁶在軍閥亂政與文武爭權的狀況下，這段時期的福建省政極不穩定。但在許世英任福建民政長官期間，曾大力追求省政改革與近代化，省政建設較有開展，並多次派遣人員來臺考察與交流。⁷

第三期是 1927-1933 年間：1926 年底北伐軍攻克福建，國民政府開始控制福建省政。陸續任命方聲濤、楊樹莊與蔣光鼐等人擔任福建省主席。但政局仍時有混亂，1933 年 11 月福建的十九路軍陳銘樞、蔣光鼐等發動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閩變），不過隔年 1 月即遭平定。⁸此一時期福建省政有了較穩定發展，各種實業教育也有進一步的擴展，因此再次派遣諸多農業與教育官員前來臺灣考察；另外福州重要企業福州電氣公司，也前來日本與臺灣參觀農業，並在福建省長支援下，開始進行福州農業改良事業。

第四期是 1934-1945 年間：蔣介石平定閩變後，1934 年 1 月任命親日派將領陳儀擔任福建省主席（1934-1941），雖然 1937 年後中日戰爭爆發進入戰時體制，但陳儀與繼任省主席劉建緒（1941-1948）仍接力積極推動了福建省

⁶ 1911 年辛亥革命後閩軍舉事，閩浙總督松壽兵敗自殺。革命黨人控制福建，建立福建軍政府，孫道仁為福建都督。其後袁世凱控制中央政權，1914 年 7 月任命李厚基為福建護軍使，同年 5 月任命許世英為巡按使。許世英任內雖有很多積極作為，但與李厚基不睦，1916 年 4 月辭福建巡按使。同年 6 月袁世凱死後，7 月間掌握北京政府政權的段祺瑞任命胡瑞霖接替許世英職位，但改稱為福建省長，李厚基仍為福建督軍。1917 年 5 月胡與李互鬥，李派軍隊包圍省長公署，胡被免去省長職務，督軍李厚基兼任福建省長。1920 年直皖戰爭爆發，段祺瑞下臺，直系與奉系軍閥控制北京政權，在這之後，1922 年 10 月因為孫中山、段祺瑞與張作霖聯盟對抗北京政權，在持續軍政混亂下，李厚基被驅離福建督軍職位。北洋政府任命薩鎮冰為福建省長，並先後派孫傳芳與周蔭人為福建督理。湯洪潮編，《民國福建省地方政權機構沿革資料（1911-1949）》（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頁 1-32。

⁷ 許世英任內的臺灣考察，參見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頁 122-133。並參見本文後面的討論與批判。

⁸ 北伐軍入閩後，當時的福建省長薩鎮冰下臺，北洋軍閥在福建的軍事控制瓦解。1927 年 1 月方聲濤代理福建省主席，5 月蔣介石改任命海軍部長楊樹莊為福建省主席，隔年因為政局混亂，方聲濤與楊樹莊輪流擔任福建省主席。1932 年十九路軍入閩，蔣光鼐任福建省主席，隔年 11 月與陳銘樞等發動事變，兩個月後遭蔣派兵平定。湯洪潮編，《民國福建省地方政權機構沿革資料（1911-1949）》，頁 33-54。

政的近代化。⁹尤其在陳儀主政前期（1934-1937）戰爭未爆發前，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福建省政府積極配合臺灣總督府的邀約，推動大規模的經建學臺灣計畫，兩岸展開密切的考察活動與經濟合作；儘管其後戰爭爆發交流中斷，但戰爭時期陳儀仍繼續借鑑臺灣經驗推動了福建省政的改革。¹⁰

以上這些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中，如第一期松壽主政時施景琛的考察（1911），第二期許世英主政時程家穎（1915）、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師生（1915）、汪洋（1916）、張遵旭（1916）等的考察，與第四期陳儀主政前期的一系列考察（1934-1937），歷史學界尤其大陸方面已有不少的研究。但筆者發現這些研究除了忽略了第三期的很多考察活動外，更大的問題是分析觀點上的一些侷限。相關研究往往僅專注這些調查活動自身，而忽略了這些調查活動所以發生的幾個重要相關脈絡，以致無法適當闡釋這些交流活動的過程與歷史意義。這些脈絡包括來自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方面的交流拉力，福建本身省政近代化的推進過程，以及臺灣籍民（紳商）的中介角色（參見下一節說明）。

筆者以為若能綜合這幾個過去未曾被放在一起考察的研究領域，重新考察與詮釋戰前福建對臺灣的調查與考察活動，不僅有助於深化認識這些交流活動的歷史意義，拓展我們對於戰前臺灣與福建複雜關係的了解，同時也能提醒我們南進政策、福建省政近代化、與臺灣籍民（紳商）中介角色的歷史關聯。另外，由於這些臺灣調查考察活動相當豐富，不同時期的調查考察活動的社會背景與歷史脈絡亦有不同。因此為了討論的完整性，本文將僅以戰前三個時期福建官方從 1911 年到 1933 年間的臺灣經建調查與教育考察活動為題，討論當時福建與臺灣互動關係中的一些重要課題。¹¹

⁹ 湯洪潮編，《民國福建省地方政權機構沿革資料（1911-1949）》，頁 55-190。

¹⁰ 相關研究，如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頁 161-217。鄭梓，〈1930 年代福建如何「經建學台灣」？——以日治時期兩份「台灣考察報告」為核心的初探〉，收入賴澤涵等編，《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頁 143-167。潘健，〈1930 年代福建「經建學臺灣」的三次考察〉，《閩臺文化交流》，2010 年第 3 期，頁 36-42。嚴如平、賀淵，《陳儀全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 103-115、173。

¹¹ 本文分類的第四期也就是陳儀主政前期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如註腳 11 所示，學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同樣因為忽略了南進政策、福建省政演變與臺灣籍民中介角色等關聯，因此在分析上

以下，筆者將先進行研究方法論的檢討，介紹有關這三個時期臺灣調查活動的既有研究，說明其分析上的侷限性，並指出如何整合南進政策、福建省政近代化與臺灣籍民中介角色等面向來進行分析。然後，將依序分三節討論三個時期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

二、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研究的回顧與檢討

關於前三期的臺灣調查活動，主要有褚靜濤、林星、黃新憲、汪毅夫與賴恆毅等人進行過分析。¹²其中汪毅夫、賴恆毅是從文學史文本分析的角度，針對相關人士的臺灣考察中有關臺灣殖民統治意象進行分析。但兩人未能細究這些臺灣考察活動發生的政策與歷史背景，且未能探討這些考察活動主要涉及的臺灣經濟調查與兩岸學知交流的問題，對這些文本的分析詮釋多有問題。林星與黃新憲等人有關農業與教育交流的討論，則主要強調臺灣總督府雖然刻意阻撓兩岸的交流，但福建對臺灣的調查考察活動，則顯示閩臺間的共同血緣、歷史與依存關係，是永遠無法被隔斷的。然而，這些分析闕漏甚多，同樣都忽略了這些調查活動的政策與歷史背景。

至於褚靜濤的研究，係以臺灣調查活動的考察與知識學習為分析主題，對議題的討論開展有許多貢獻。不過其研究仍有許多侷限性，首先他忽略了

有很多的闕漏。參見筆者另文的檢討：林文凱，〈同床異夢的兩岸關係：中日戰爭前夕臺灣與福建間的經濟建設與農業調查活動之交流（1934-1937）〉，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週二演講活動報告，2017年11月28日。

¹² 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頁101-160。林星，〈博覽會視角下的近代閩臺交流〉，《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11-16；同作者，〈日據時期閩臺農業交流的概況及特點〉，《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2年第4期，頁103-109。黃新憲，〈日據時期的閩臺教育關係〉，《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卷2期1（2000年1月），頁7-13。汪毅夫，〈臺灣遊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臺灣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閩臺歷史社會與民俗文化》（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頁10-20。賴恆毅，〈臺灣的旅行經驗及其文化意涵——以「臺灣勸業共進會」相關記錄為例〉，《實踐博雅學報》，期14（2010年7月），頁89-113。秦詠英，〈民國時期的臺灣研究綜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頁60-66。林靜，〈日據時期閩臺農業交流述評〉，「殖民主義與臺灣歷史學術研討會」，廈門：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等主辦，2016年11月5-7日。

1927-1933 年間福建對於臺灣的不少重要考察活動；另外，他認為福建的經濟建設是在 1934 年陳儀主政之後才展開，主張在這之前的臺灣經驗被「束之高閣」，並未對福建省政產生影響。但若細究陳儀主政前福建省政的變化，將發現其實臺灣經驗（與日本學知）在這之前已對福建省政建設產生一些可觀的影響。但是其分析最大的問題是，僅從福建一方的角度來分析，未曾注意這些臺灣調查活動與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的關聯，同時忽略調查活動背後許多臺灣籍民菁英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進一步提出本文對於臺灣調查活動的分析框架之前，筆者先解釋一下調查活動所涉及的學知交流的意涵。晚近日本帝國史與東亞交流史的研究注意到，十九世紀晚期以來東亞各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或者日本帝國對各地的殖民擴張與統治，都涉及到來自西方或者日本中介的近代學知的學習交流。學知交流包括涉及各種政治經濟與文化現象的諸種近代學科知識，同時也涉及學知交流所需的各種近代調查考察活動。而在分析這些學知交流時，則應關注「人的資源」（生產學知的人與組織）、「制度組織資源」（支持學知與調查活動形成的制度與組織）、與「知識的資源」（構成學知內容的知識體系與認識架構）等三個層面。¹³事實上，如本文以下分析所示，福建官方為了借鑑臺灣經驗所推動的臺灣調查考察活動，即涉及了福建與臺灣方面的各種人、制度組織與知的資源。

¹³ 過去有關日本帝國與殖民地史的研究，主要關注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擴張過程與殖民地的民族主義抵抗運動，相關分析並集中於政治與經濟面向的帝國主義論與殖民主義分析。1990 年代以來，日本學界開始將相關討論擴展到有關帝國擴張與殖民地支配的各種近代學術知識的文化史分析。有關學知交流在東亞近代史與日本帝國史研究的意義，參見岩波書店 2006 年出版的岩波講座叢書《「帝国」日本の学知》（共八卷）。至於學知交流的分析所涉及的三個層面的討論，參見末廣昭在編集該叢書第六卷時所撰寫的導言，〈序章 他者理解としての「学知」と「調査」〉，收入氏編，《「帝国」日本の学知：第六卷 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9。目前學界有關日本帝國的學知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與其各殖民地，較少進一步分析其如何擴展與影響非殖民地的華南地區的學知發展與近代化，而且討論也集中在日本殖民者有關帝國擴張與殖民支配的學知活動分析，較少關注非殖民地人民對於日本學知的主動繼受與交流學習。本文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筆者感謝審查人之一提醒，應交代本文有關學知交流研究方法的看法。

接著，本文分析這些調查考察活動時，應注意到幾個重要觀照面向，即關注其與臺灣南進政策脈絡、福建省政變革、以及臺灣籍民中介關係之關聯。首先，應注意的是多數的臺灣調查，尤其福建省政府發動的調查，不應單純將其看作是福建一方主動發起的調查活動，事實上這些調查很多是臺灣總督府基於南進政策的考量，主動邀請來訪的結果。臺灣總督府的考量除了宣揚殖民統治的成功外，也希望透過臺灣經濟發展的實地介紹，建立臺灣與福建官方的交流網絡，並希望臺灣官方或日本與臺灣民間人士得以參與福建各地的經建投資計畫。這些調查活動的規劃很多是在總督府官員的引導下展開的，即使是參觀者自己規劃的參訪內容，因主要參觀的地點都是官方機構，若無總督府的官方許可，並無參訪可能。因此研究者分析這些參訪活動時，必須注意到隱藏在這些參訪行程背後總督府政策與人員的施力痕跡。

其次，前面提到閩浙總督松壽係在清末新政的脈絡下，派遣施景琛來臺考察。但應進一步強調的是，這個考察其實與晚清中央與福建地方政府的新政改革有關，當時不僅清廷中央參酌日本明治維新改革政治體制，福建主政官員也注意到日本治臺的成功，因此試圖借鑑臺灣經驗來改革閩政。另外，1915-1916年間福建巡按使許世英之所以積極回應臺灣總督府並推動臺灣考察活動，係與其個人對於閩政改革的看法有關，同時也與其從政早期對於日本學知的經歷與看法有密切關聯。最後，北伐後 1920 年代晚期福建對於臺灣的考察活動，如下文所示，則與國民政府從中央到東南各省積極推動的行政近代化，尤其農政改革有著密切關係。

其三，透過日本華僑移民、華僑商人與晚清民初日本留學史的研究，可以發現從明代中葉以來，福建尤其廈門與福州等地就大量往東南亞與臺灣等地移民，但同時也與日本之間有非常多的往來。福建人到日本，明清兩代主要是經商與作苦力，有些人成為旅日華僑，並且成為東亞商業網絡的重要組成分子。¹⁴

¹⁴ 市川信愛、戴一峰、和田正廣編，《近代旅日華僑與東亞沿海地區交易圈》（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朱德蘭，《長崎華商貿易の史的研究》（東京：芙蓉書房，1997）。松浦章，《清末民国初期の福建省海外移民事情》，收入藤善眞澄編，《中国華東・華南地区と日本の文化交流》（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2001），頁 159-179。

而晚清甲午戰爭日本勝利之後，不僅日本明治維新成爲晚清新政改革的範本，加上日本與中國距離較近，具有漢文等東亞同文因素，因此中國各地尤其福建地區也衍生出到日本留學的廣大風潮，日本繼之前的西方英美等國後，成爲中國朝野新式學知的主要學習對象。¹⁵

此外，晚清福州與廈門開港後，日本很早就在福州（1872）與廈門（1874）建立領事館，雖然之後兩地領事館設置屢有合併更迭，但一直是日本刺探華南政治經濟與文化情報的基地，領事館人員並與福建朝野菁英建立各種親善關係；¹⁶而後，隨著臺灣成爲日本殖民地之後，更在南進考量下積極利用在地日本人與臺灣籍民和福建官紳建立種種緊密的關係，藉以擴展日本帝國在福建的勢力。¹⁷以下考察臺灣考察活動時，可發現臺灣總督府在推動南進政策以及勸誘福建官民前來考察時，這些在福州與廈門的日、臺人士與福建菁英的網絡是很重要的中介關係。

接下來，我們就從上述幾個面向著手，重新闡明這些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的過程與內涵。

三、1911 年間施景琛臺灣考察活動的分析

首先討論 1911 年間新設的福建工業學堂監督施景琛，奉閩浙總督松壽之命來臺的考察活動。但討論之前，有必要先了解施景琛來臺背後的日本學知網絡因素。

¹⁵ 清末留日學生的整體討論，參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福建留日學生的討論，參見張先清、劉映珏，〈清末福建留日學生狀況探討〉，《福建史志》，1999 年第 1 期，頁 38-42。黃嘉康，〈近代福建教育推手：陳寶琛與福建教育近代化事業〉，收入周佳榮、范永聰編，《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 303-320。另外，佚名作者整理的近代《福州名人傳》，顯示一半以上的福州名人有留學日本的經歷，參見：<http://www.nanchens.com/gdjj/gdjj01/gdjj01038.htm>（2016 年 10 月 21 日檢索）。

¹⁶ 日本在福州與廈門領事設置時間與其變動，參角山榮編，《日本領事報告の研究》（東京：同文館，1986），頁 483、485。

¹⁷ 臺灣籍民與商人在福建的活動樣態，參見鍾淑敏，〈日治時期台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頁 399-452。林滿紅，〈臺灣資本與兩岸經貿關係（1895-1945）——臺商拓展外貿經驗之一重要篇章〉，收入宋光宇編，《臺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 67-139。

晚清福建留日風潮很盛，不僅如此，晚清新政期間在福建創設的各種學堂也與日本學知有著密切的關係。¹⁸當時福建新設學堂，包括福州蒼霞精舍（1897）、福州蠶桑公學（1900）、福州東文學堂（1898）、廈門同文書院（1900）、全閩大學堂（1902）、全閩師範學堂（1903）等。這些學校創建者，如陳寶琛、陳璧、劉崇傑等人，都是主張借鑑日本學知，或者本身就曾留學日本，他們也鼓勵學堂畢業生繼續到日本留學。¹⁹應注意的是，這些學校不僅引入了很多的日本教習，普遍提供日語教學，且如福州東文學堂與廈門同文書院等，從成立過程到實際的經費支持上，更有來自日本政府外務部福州領事與臺灣總督府在南進政策下的大量協助。同時這些興學事業，亦有福州與廈門的臺灣籍民菁英如板橋林家林維源、²⁰林爾嘉、²¹林熊徵²²等人與

¹⁸ 晚清新政期間，中國對於日本改革經驗與新式學知的學習，以及兩國政治與學界的密切關係，參見任達（Douglas R·Reynolds）著，李仲賢譯，《新政革命與日本：中國，1898-191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¹⁹ 福建新式學堂的成立始末，參見劉海峰、莊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頁 250-289。但其分析，只注意清朝中央與福建省政官方的興學努力，而忽略了當時日本中央與臺灣總督府等在南進與對岸政策脈絡下，對於福建興學所提供的助力。

²⁰ 「林維源（1838-1905）……淡水枋橋（今板橋市）人，林平侯之孫……與兄維讓共同經營『林本源』號之墾務事業……歲收租穀二十餘萬石，遂為全臺巨富。十七年（1891）以清賦功，晉太僕寺正卿。十九年（1893），板橋林家花園落成。甲午戰後，臺灣割讓，臺人自立民主國，被舉為議長，不就，而攜眷舉家內渡，居廈門鼓浪嶼以終。」張子文等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頁 276-277。

²¹ 「林爾嘉（1875-1951），字叔臧，又作菽莊，別署百忍老人，林維源長子，臺北板橋人。……乙未（1895）割臺，與父親及弟妹舉族內渡，返回故鄉福建龍溪原籍，嗣定居廈門鼓浪嶼。尋捐授知府。光緒二十四年（1898）農工部保舉為四品京堂，派為廈門保商局總辦兼商務總理。民國肇建，被選為國會議員，任福建行政討論會會長、鼓浪嶼公共租界工部局華董、廈門市政會會長。段祺瑞執政時，聘為華僑總會總裁……並創菽莊吟社，一時名流，多假其地行吟論藝，翰墨琳瑯，為南中文化淵藪。」張子文等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 274。

²² 「林熊徵（1888-1946），字薇閣，臺北板橋人……係林本源家族長房〔本記〕林國華之曾孫，〔益記〕爾康長子……七歲時遭逢割臺之變，隨父祖內渡大陸，居廈門鼓浪嶼。自幼延師學習經史，能詩文。稍長曾加入同盟會，並捐巨資支助革命運動。1908年4月（明治四十一年）任剛成立未久之林本源製糖會社副社長。三年後林本源家族分產，乃於次年返臺繼承事業……並在日本政府機構中擔任……臺灣總督府評議員等職……1923年日皇太子裕仁來臺訪問，臨行之際單獨接見並賜贈尚勳四等瑞寶章。次年和辜顯榮等共組臺灣公益會。可說是日據時期本省最著名之紳商和實業鉅子之一。」張子文等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 272-273。另外，林熊徵之母陳芷芳為陳寶琛之妹，甲午戰爭爆發後不久林父林爾康過世後，林母曾帶著林熊徵回到福州居住，依靠陳寶琛。林家曾捐巨資四萬元資助陳寶琛在福州東文學堂基礎上改設的全閩師範學堂辦學。施景琛，〈鯤瀛日記〉，收入臺銀經濟研究室編（下略），《臺灣遊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63-64。此外，林熊徵曾參加林森在上海所組織的革命團體「福建學生會」，後一起加盟 1904 年在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並捐資

林軫存²³等，在辦學資金、地方菁英網絡與社會輿論上的大力支持。²⁴

在實業教育方面，福州蠶業學堂（1905 年創辦）、福建官立商業學堂（1906）、福建官立農業學堂（1910）、福建官立中等工業學堂（1911）等四所學堂，主事者都是留日歸國學人或有日本考察經驗。²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不少人還有臺灣關係的背景，擔任工業學堂監督的是出身臺灣鹿港並曾三次赴日本考察的施景琛，²⁶該校一開始的少數幾個師資中有臺灣電報學堂畢業生陳起彪，而擔任商業學堂監督的陳訓旭則與臺灣有特殊關係；²⁷另任福建農業學堂主任教員的則是留學日本農業大學畢業的臺灣籍民洪禮修。²⁸

贊助中國革命，因而與福州菁英林森（曾代理福建省長）、方聲濤（曾代理福建省主席）等有著密切關係。林熊徵學田基金會編，〈林熊徵先生傳〉，林熊徵學田基金會網站，<http://www.ta-yung.com.tw/index.html>（2016 年 10 月 15 日檢索）。

23 「林軫存，字景商，福建安溪人，林鶴年（鵬雲）第四子。少隨父祖寓居臺灣，寄籍淡水。乙未（1895）滄桑，臺灣割讓予日，隨家人內渡，居廈門鼓浪嶼，並入籍安溪。後薦經濟特科，嘗上書言變法，光緒帝嘉納，旋以郎中用……民國成立後，海外及本省皆當選為議員，又為臨時參議院議員，後又被舉為眾議院議員。國會解散後，被華僑舉為福建暨南局總理……因家族有事業在臺，經營茶、腦及金礦業，故不時往來臺廈之間。」張子文等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 269-270。另應注意林軫存因多次游日，並常往來臺灣廈門，曾上書伊藤博文，頗受看重；並曾與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在廈門創辦東亞書院；在廈門期間也與日本廈門領事上野專一開設「赤十字社」。參見施懿琳撰寫條目，〈林軫存〉，「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xcm.nmtl.gov.tw/twp/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1040>（2016 年 11 月 11 日檢索）。

24 日、中學界對於廈門東亞書院與福州東文學堂的成立始末，往往各自倚賴日文或者中文史料，分別強調日本政府與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脈絡或者福建本土仕紳興學的結果。但較新研究則呈現了中日雙方在這其中的共同作用。參見黃慶法，〈福州東文學堂述論〉，《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2 期，頁 75-81；黃慶法，〈廈門東亞書院籌辦始末〉，《教育評論》，2009 年第 2 期，頁 129-132。

25 劉海峰、莊明水，〈福建教育史〉，頁 283-285。

26 根據《鹿港鎮志》資料：「施景琛，字涵宇，同治十一年（1872）生於鹿港，早歲喬寓福州，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式舉人。歷任中華民國眾議院議員、總統府、國務院秘書、參議等。日治時期曾來臺觀光，時籍隸福建長樂。光復後返臺居臺中。」吳文星編，〈鹿港鎮志 人物篇〉（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頁 44。但如本文所示，施氏來臺為奉命考察，非為單純觀光。

27 陳訓旭福州人，其父曾在清朝政府的馬尼拉學校教授國文，後來臺做了私塾先生，臺灣割日後，憤而返回福州。而陳訓旭則在 1904-1909 年間就讀東京高等商業學校獲得學位，隔年回國任福建省立商業學堂新任監督。劉立強，〈神州盡舜堯 巾幗有英豪：深切懷念母親陳舜英〉，收入皇甫建偉、宋保明編著，〈烽火巾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頁 144-151。

28 洪禮修，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畢業（1902 年入學，畢業年可能 1906 年），1906-1908 年回臺任職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雇員，1910 年到福州擔任新設福建官立農業學堂主任教員，該校後改名為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另依資料，該校至少還有另一名日本籍教員（民國 5 年 2 月）。〈件名：省立甲種農業學校續聘大森四郎為教員抄送合同諮請備案〉，《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8/e7/90.html>（2016 年 10 月 23 日檢索）。

因此，從前言所述的南進政策背景與晚清福建地區日本學知的脈絡，以及福建地區臺灣籍民的網絡關係，我們就可以較完整地理解為何總督松壽會委任施景琛等人伴隨諸多臺灣關係者，來臺灣考察實業建設經驗。

接著，我們依據施景琛撰寫的《鯤瀛日記》一文，討論其在 1911 年 2 月 27 日到 3 月 17 日來臺考察 18 日的過程。實際考察行程為全臺北中南各地，包括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鐵路建設、權度專賣二局、物產展覽會、教育展覽會、打狗港口工事、血清作業所、製糖會社工場、糖業試驗場、苗圃、竹器製造傳習所、製麻會社、磚瓦工場、瑞芳金礦、埕公圳工事、水源地、發電所、電話交換所、臺北監獄、民政當局、鹽務機關以及土地調查與改善市區辦法等。²⁹

施景琛抵臺參觀前，先在福州接受日本福州領事的送別，搭乘大阪公司的汽船到達廈門，由諸多臺灣籍民陪同在廈門龍溪參觀近一星期，才啓程赴臺。在廈門期間，施景琛接受林軺存、林爾嘉、施士潔等有臺灣籍民身分的廈門紳商菁英，以及日本廈門領事的熱烈款待，並與廈門日報和全閩新日報（總督府扶植的福建報紙）的記者會面。接著參觀臺灣籍民郭春秧的華祥製糖公司，並與林爾嘉等商紳座談廈門商況，討論福建工業幼稚缺乏提倡的困境。而後更有林爾嘉、陳少鐵與林季商³⁰等臺灣籍民，陪同渡臺考察。更應注意的是，施景琛不是獨自到臺灣考察，同行的還有福建商業學堂監督陳訓旭與福建農業學堂主任教員洪禮修。

其次，其一行從抵達淡水開始就有總督府官員與臺灣紳商到車站歡迎，而後的參觀行程則都是臺灣總督府的各種機關，並有總督府官員在介紹各機關業務時，說明臺灣經濟建設的歷程與詳細成就。他在考察期間，非常頻繁地與諸

²⁹ 施景琛，〈鯤瀛日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41-68。

³⁰ 林季商為霧峰林家林朝棟之子，其在臺灣割讓後回大陸維持中國籍，協助其父處理上海、廈門、福州的產業。但 1898 年，林季商為了料理臺灣產業，又返臺入籍。但仍時回福建處理或投資福建產業，也曾領導廈門人支持排斥日貨運動，1913 年曾任督辦使督率 1500 名新兵討伐華南土匪。但在 1912 年以日本籍身分開辦福建產業華對疏河公司，遭到攻擊為由，向臺灣總督府請求諒解申請脫離日本籍，總督府在 1915 年同意。鍾淑敏，〈臺灣籍民與臺灣華僑〉，收入甘懷真、貴志俊彥、川島真編，《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88-189。

多日本官員以及臺灣商紳飲宴，並吟詠漢詩與這些人士互相酬贈。³¹我們從行程中臺灣總督府官員的全力配合，就可以發現總督府顯然希望透過臺灣實業建設經驗的展示，與福建省官方建立親善關係，甚至能夠參與福建的經濟建設。同時也從林輅存、林爾嘉、郭春秧等人在行程中與其的互動關係，可瞭解到考察活動中，這些臺灣籍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應注意的是，施景琛在臺南考察期間，接受臺灣商紳的款待時，曾發表談話說明他的參訪感想：

鄙人近以福建實業協會名義來臺調查實業，所望於吾兄弟者〔筆者按：指臺灣諸商紳〕，亦在於振興實業。其關於本島實業，吾兄弟應負推廣之責；其關於祖國實業，吾兄弟應負扶助之責。亞洲實業果能凌駕歐美，則富強之基鞏固不搖，即吾兄弟所以報吾父母〔筆者按：指中國〕、吾伯叔〔筆者按：指日本〕生育提攜之恩於無極也。吾兄弟勉之。³²

這段感想中表明他期望臺灣商紳前往福建投資，協助母國的實業建設；另一方面也呼應總督府的中日親善訴求，希望追求亞洲的共同富強。³³

最後，分析施景琛等人與日本總督府高官以及臺灣商紳菁英在宴飲場合的漢詩文酬酢活動的複雜意義。首先，施景琛雖然多次到日本考察，並為福建新式教育的主要推動者，但其本身是舊文人出身，擁有科舉功名並為福建有名的詩人，經常參與林爾嘉等詩人的詩社活動。他來臺灣考察經濟建設，也很自然地透過漢詩文的交誼，與臺灣的傳統紳商菁英表達歡聚誌慶與風雅；同時使用這種帶有漢文化意味的文學形式，來共同表達民族主義意識，或控訴與哀嘆日本殖民統治的意義。如他在與臺南紳商宴飲，聽臺灣菁英批判日本對臺人的歧

³¹ 共同宴飲的臺灣商紳如辜顯榮、林熊徵、魏清德、林季商、蔡法平等，另外還與連雅堂及南社、櫟社、瀛社諸人宴飲並舉行詩會。

³² 施景琛，〈鯤瀛日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50-51。

³³ 應注意的是，在這段感謝的前段，他也表示瞭解臺灣人對於總督府在教育、司法與實業政策上的歧視之不滿，但同時也為總督府緩頰，認為總督府將來應會改善。曰：「然吾父母既以諸兄弟託付於吾伯叔之手，想吾伯叔篤同宗之誼，終有以副吾兄弟之希望，與伯叔之兄弟享同等之幸福，無歧之猜疑也。」施景琛，〈鯤瀛日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50。

視時，除了安慰臺人日本終究會滿足臺人的願望外，也賦詩一首詩題〈全臺紳商公燕臺南館，即席奉贈〉，以表達兩岸分離的感傷：「落拓青衫淚欲盈，琵琶嗚咽不成聲。漢家伏臘今猶在，晉代衣冠近未更。燕雀處堂知自警，駑駘伏櫪感哀鳴。尊前無限傷心事，拋卻天涯舊弟兄。」³⁴

但如同臺灣歷史與文學研究者所廣泛指出的，漢文雖然是中國文化的象徵，但對於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人來說，漢詩文對其也具有同文的意義，大部分 1920 年代以前來臺的總督府與地方高官都有一定的漢詩文素養。而且日治初期，總督府爲了降低臺灣士紳對於異族殖民統治的疑懼與否定，刻意強調日中之間包括儒教忠孝傳統與漢詩文在內的種種同文現象。並爲了籠絡士紳菁英認同殖民政府，並協助殖民統治，刻意頒授紳章給臺灣傳統科舉菁英，肯定並延續其在地方社會的菁英地位，同時邀請這些文人菁英舉辦揚文會與詩會，透過這些詩文唱和，藉以與臺灣菁英溝通意見、聯絡感情。³⁵

我們注意到施景琛來臺期間，就留下七首與日人高官唱和的漢詩，表達中日親善的期待，譬如在詩題〈贈臺灣總督府屬池浦和三郎、臺南廳屬牧野斌、鹽務專賣所支配人鉅鹿赫太郎〉，賦詩曰：「相逢海外若平生，誰主誰賓謝送迎（余到臺參觀，一切多由三君招待）。千里不勝輪鐵倦，同文多感譯鞦清。曉風殘月餘詩夢，豪竹哀絲帶酒醒。東亞且聯唇齒誼，兩家門戶各支撐。」³⁶

³⁴ 另外幾首與臺人應酬之詩，也表達同樣的民族情懷。如詩題〈贈趙君雲石〉，吟曰：「海外論詩浪得名，英雄兒女罄平生。傷心故國家何在，橫涕新亭歲幾更。笑我才華成畫餅，嘆君骨肉等分羹。中原今日還多事，鶴唳風聲處處驚」。另詩題〈鹿耳門懷古（限遲疲誰韻）〉，詩云：「回首東隅歎已遲，奔潮澎湃亦云疲。延平地下應遺恨，錦繡河山付與誰。七鯤一舸下遲遲，東望顏垣力已疲。牽犬終羞過上蔡，河山今日屬伊誰！」或如另一詩題〈贈臺灣日日新聞社、臺灣新聞社、臺南新聞社記者及南社、櫟社、瀛社諸詞宗〉，則云：「腸斷桄榔黯黯天，棄民身世有誰憐？東山絲竹中年感，北海琴樽異地緣。田島英風懷五百，孔門遺教仗三千。詩人寄託原餘事，此去休忘祖逖鞭。」以上各詩參見施景琛，〈鯤瀛日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65-67。

³⁵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入若林正丈、吳密察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公司，2000），頁 105-181。

³⁶ 參見施景琛，〈鯤瀛日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67。

四、1915-1916 年間許世英任內臺灣考察活動的分析

接下來，分析許世英主持閩政期間所推動的臺灣調查活動。但討論前，應先瞭解許世英對近代學知的認識與其改革閩政的構想。許世英 1873 年生於安徽省秋浦縣，1897 年拔貢考試通過後擔任刑部主事。他在 1908 年任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因此和日本駐奉天領事廣田弘毅、副領事有田八郎相熟，並建立長期友誼。這段經歷使他對於日本學知有所認識，並在福建主政期間（1914.05-1916.04）主動引入日本近代學知改革閩政；同時也因其對日本的認識與人脈關係，而在 1936 年中日外交最艱困時期，被任命為駐日大使，期待其斡旋中日緊張關係。³⁷

（一）許世英的閩政改革構想

有關許世英的閩政改革想法，可以透過其〈閩海巡記〉一文來加以瞭解。許世英在擔任福建巡按使約一年後，接到大總統袁世凱命令要求巡視福建沿海各縣，乃從 1915 年 5 月 24 日到 7 月 4 日，親身從福州到閩南沿海參觀各地山川險要與人情風俗後撰寫此文，從中可理解其對近代學術與改革的認識和構想。

許世英巡遊的重心擺在福州與廈門地區，他在福州巡視近十天，另有十幾天在廈門。主要參觀行程為各地政府衙門、海關、海防、警備隊與各級學校，並與官員和地方商紳晤談。他觀察街道市況、衛生與各項建設，並感慨福建各地市況大多蕭條，衛生欠佳，缺乏建設。許也關切各地社會風俗，並感嘆各地婦女纏足、械鬥嚴重又好訟，要求各地官員嚴禁械鬥清釐積案。他亦欣賞河山風景，並與地方官紳唱和作詩對聯。而在巡視南安參觀延平王祠之時，曾賦詩：

³⁷ 許世英口述，冷楓撰記，《許世英回憶錄》（臺北：人間世月刊社，1966）。另有兩個報導，提到他曾赴日本習法律，黃伯度編，《許世英先生紀念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頁 63、66。另廣田弘毅為知名外交官，數度擔任日本外交大臣，並在中日戰前擔任過內閣總理大臣（1936.03-1937.02）；有田八郎亦為知名外交官，中日戰前廣田弘毅組閣期間與戰爭初期曾任日本外務大臣。服部龍二，《廣田弘毅：「悲劇の宰相」の実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8）。

「東海望台澎，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同時與廈門官紳論及：「閩省海防之重要，政治之迂緩，籍民之滋多，皆足使人短氣。」³⁸

許世英非常關心教育，認為教育才能讓國家富強，頻繁視察各地的學校，並感慨各地學校多為教會或外國勢力所創辦，教育內容未必完全符合國家所需。他曾召集廈門十三間學校在廈門教育會開訓勉會，並在致詞中說道：

民國成立，已屆四年，國家之政治若何，社會事業者若何，其幼稚更甚於諸生。今日……與諸生約略言之。立國之要有三：土地、人民、政治，古之所謂三寶也，三寶修則民富而國強，三寶廢則民貧而國弱……閩省……乃山藏海富之區，仍不免號寒啼饑之歎。觀之色沮，言之心傷。可以一語蔽之曰：士〔土〕地荒蕪。以言人民，無過去之觀念，無未來之思想，無自治之能力，無合群之知識。……可以一語蔽之曰：人民鄙陋。以言政治。官場習氣，養自前清，卑鄙齷齪，無可為諱。……可以一語蔽之曰：政治腐敗。……而輔助進化之器，在於學術，以學術經營土地，無荒蕪之不可開闢；以學術治理人民，無鄙陋之不可更化；以學術振興政治，無腐敗之不可改革。³⁹

而在視察過程中，他屢次提及自己最關心的是實業與商業振興以及市政建設，並希望華僑與地方商紳能夠投資內地、協助推動這三項事業。許世英還在廈門華僑商紳組織暨南會的歡迎會上，表明自己很高興看到廈門僑商從 1913 年開始建立僑商的公共機關，並且歸國投資、振興各業，使人民得以餬口，並維持地方的秩序。而且強調過去國家無力無法保衛僑商，因此可以理解僑商入籍國外之事。並表明現在開始大總統（袁世凱）與主政閩省的自己會保護僑商，希望僑商協助振興各項實業與銀行金融。⁴⁰

³⁸ 許世英，〈閩海巡遊〉，收入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東至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下略），《許世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頁 59-120。

³⁹ 許世英，〈閩海巡遊〉，收入《許世英》，頁 93-94。

⁴⁰ 許世英，〈閩海巡遊〉，收入《許世英》，頁 83-85、95-96。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廈門十餘日，幾乎每日與林爾嘉和林軺存等臺灣籍民商紳互動。他多次參加林爾嘉的宴會，參觀其菽莊花園，與其合開詩會。並讚揚他學識開明、熱心國事，認購公債尤多。許世英除參觀福州廈門等地僑商興辦的重要企業，如廈門淘化與大同罐頭公司，福州電氣公司以及漳州的華祥製糖公司。⁴¹他更在與廈門官員、林軺存及林爾嘉等僑商參觀會談中，瞭解到福建製糖業與醬油業的蕭條現況，以及閩省振興實業應採之法。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僑商強調臺灣製糖業與日本醬油業發達，並大量輸出至福建以致本地民生產業衰落，建議閩省官員能協助採用類似的產業與財稅政策來振興相關產業。⁴²

透過以上許世英的經歷與主持閩政的理念，我們方能充分認識，為何他既有強烈的愛國意識，且意識到列強包括日本的競爭與威脅時，卻仍主動回應臺灣總督府帶有南進政策侵略意涵的邀請，派員前往臺灣進行各種考察。⁴³

⁴¹ 許世英 1915 年參觀的廈門淘化罐頭公司（史料中記為淘化罐頭食品廠），係 1908 年由南洋華僑楊格非與陳天恩等人開辦，後因股東紛爭楊格非離開淘化，改由陳天恩（許世英參觀時的接待人之一）等人經營；楊格非另於 1913 年與華僑陳嘉庚成立大同醬油廠，即為許世英文中提到的大同罐頭公司。這兩家工廠因競爭激烈結果兩敗俱傷，後乃於 1927 年間合併為廈門淘化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參見許世英，〈閩海巡遊〉，收入《許世英》，頁 92-93。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廈門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冊 5，卷 44，〈華僑〉，頁 3422。福州電氣公司，是福州劉崇偉與林長民等菁英家族合資成立的，他們都是留日的知識菁英。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福建省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1），頁 118。華祥製糖公司是南洋華僑同時也是著名臺灣籍民郭春秧，在故鄉漳州地區創辦的福建第一家機械製糖廠，甘蔗與機械設備均移植自臺灣。外務省通商局編，《福建事情》（東京：啓成社，1917），頁 150。

⁴² 許世英，〈閩海巡遊〉，收入《許世英》，頁 99-100。

⁴³ 許世英雖然希望以日本經濟學知改革閩政，但並不親日與媚日，根據知名福建史家李啓宇的考察，袁世凱 1915 年 5 月接受日本二十一條要求時，全國群情激憤，但福建督軍李厚基表示全力支持，許世英卻代表福建人民致電北洋政府表達反對的基本立場。另史界普遍肯定許世英一生為官清廉，官聲良好，他 1916 年 4 月辭任福建巡按使時，將三年間累積的巡按使規費 16 萬兩捐給福州修建馬路。參見李啓宇，〈「天風海濤」的題寫者許世英〉，刊於廈門數字文化館聯合網，http://www.xmwhg.com.cn/llyj/qwlllyj/mryxm/201607/t20160707_40923.htm（2016 年 10 月 15 日檢索）。不過，二十一條事件的表態惹怒了袁世凱，以該年 2 月間有人控告許世英「任用私人、縱盜殃民」為由，派人到福建查辦，許世英在此壓力下，轉而在 7 月間表達對袁世凱恢復帝制稱帝的支持，9 月間調查結果還許世英清白，躲過參劾。到年底，袁世凱宣布接受帝位時，對擁戴有功者加官晉爵，許世英被賜封「一等男」爵位。此事成其從政汙點。參見另一有名福建史家薛宗耀之考證研究，〈許世英遭參劾始末〉，「福州新聞網」，<http://culture.fznews.com.cn/minhaishenzhou/2014-8-11/2014811XSF3SHX9PO183345.shtml>（2016 年 10 月 15 日檢索）。

（二）程家穎的臺灣土地制度考察

接著，簡要說明在許世英任上的幾次臺灣考察活動。首先，許世英 1912 年擔任司法總長時曾派早稻田大學畢業司法部編纂程家穎，前往日本考察土地登記制度。其後，許世英擔任福建巡按使時，因為總統袁世凱模仿日本改革經驗設置經界局推動全國性的土地調查事業，⁴⁴許世英積極支持此一政策，乃在 1914 年 7 月向袁世凱報告擬在福建省進行土地清丈，獲准後，派遣程家穎前來臺灣考察土地調查事業經驗。程家穎來臺灣考察約一個半月，在臺灣總督府官員的殷勤招待與協助下，在 1914 年 12 月呈交完成的《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⁴⁵

報告共分三章，第一章介紹了臺灣土地制度之沿革；第二章介紹了臺灣土地調查概要，說明總督府在臺灣的土地調查過程，包括大租權確定及消滅、改革地賦、調查經費；第三章則是條陳閩省清地辦法大綱。條陳中並建議，不應取鑒劉銘傳僅求清賦的土地清查經驗，應酌量借鑑日本人清量臺灣土地的經驗，完成地類調查並保障人民的私權。最後還附上之前前往日本調查完成的《日本登記制度考查報告書》。

關於報告內容，前述提及的褚靜濤的研究，誤認為程家穎主張：「應取鑑劉銘傳及日本人清量臺灣土地的經驗，丈量福建土地。」但其實細察程的報告內容，乃解釋劉銘傳的辦法會造成的種種問題，強調不宜採用，而應採用日人的辦法。另外褚靜濤主張，許世英最終僅將該報告送給北洋政府內務部、財政部與經界局參考，報告本身被「束之高閣，未能發揮實際作用」。但這說法也有問題，許世英在收到報告後，就在 1915 年 1 月成立了福建土地調查籌辦處，並委任程家穎擔任籌辦員，具體擬定「清丈土地試辦章程」、「設立經界行局」、

⁴⁴ 北京政府為建立近代土地制度，並有效增加財政收入，曾在 1914 年 2 月設立土地調查籌辦處，在隔年 1 月設立經界局，並聘用大量日本留學經驗者，希望模仿日本與臺灣、朝鮮等殖民地經驗進行土地調查與改賦事業。但未能順利推動，1916 年 7 月廢除經界局宣告政策終止。參見笹川裕史，《中華民國期農村土地行政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頁 21-38。

⁴⁵ 程家穎，《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參見臺灣圖書館日治圖書全文影像系統掃描檔，<http://stfb.ntl.edu.tw/cgi-bin/gs32/gswweb.cgi/ccd=ZtgJLs/search>（2016 年 10 月 15 日檢索）。

「經界評判會」、「丈量員實行規程」、「事務員實習規程」等各種辦法。並考選了 60 位丈量員進行了四個月的訓練與實習課程，可惜北京政權動盪，在缺乏中央支持下，福建的土地調查事業終在 1915 年 6 月左右半途中止了。⁴⁶

（三）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的臺灣教育考察

接著，討論 1915 年 12 月上旬，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校長何纘帶領 40 餘名師生來臺灣參訪旅行的遊記，⁴⁷由邱文鸞、劉範徵、謝鳴珂等 3 人記載來臺期間的考察過程與感想。該校可以說全面考察了臺灣的農業行政與研究相關機關，考察行程：「分為農林行政（官署、農會、氣象臺、試驗場、陳列所、苗圃、屠場、統計）、農林教育（學校、講習所、通俗教育）、農林製造（樟腦、製茶、製糖、草帽、蓆、製紙、菰類之製造、罐頭製造、製酒、煙草、製藍、製絲、藤之利用、植棉、果樹園藝、木材工場、肥料會社、農具會社、蔬菜乾燥）、農林經營實地狀況（阿里山、耕地整理、作物改良、牧畜、灌溉及排水、土地臺帳）及漁業等」。透過三個旅行記可以發現，參觀與導覽非常專業，考察內容充滿專業性的介紹，且有大量統計數字與調查報告。⁴⁸

首先，應強調的是這個參訪旅行，受到許世英的大力贊成與資金贊助。另外，旅行記中也提到臺灣總督府不僅全程盡心招待，派人協助導覽各農政與農業試驗機關，同時還免費贊助學生在臺北以外的住宿費與交通費。另一方面參訪團此行在臺北的膳費一切，則由板橋林家第一房的林熊徵提供招待，林家除派人員協助庶務外，也請與福建菁英關係緊密活躍於福建政經界的蔡法平引導招待眾人。可見這個參訪也與福建臺灣籍民有著密切關係。⁴⁹

⁴⁶ 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頁 122-123。程家穎，《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頁 99-102。另參照許世英兩年治閩期間施政內容的兩冊公牘，發現其中約五分之一內容為福建土地調查事業的政策施為，可見其對此事業的重視。參見許世英，《治閩公牘》，下冊（未出版）。

⁴⁷ 校長何纘，字系甫，福建閩侯人，本身也是熟悉日本學知之人。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獲農學士學位。在旅程導覽中偶爾協助學生翻譯日人的日文講演。

⁴⁸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下略），〈弁言〉，《臺灣旅行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頁 1-2。

⁴⁹ 蔡法平（1881-?），福建侯官人，本籍臺北州臺北市御成町。福州馬尾海軍學校出身，往日本留學，後投身實業界，1917-1918 年任福建銀行等，1932 年任滿洲國秘書課長。其與林熊徵關係密切，協助林管理中日臺的龐大產業。與林熊徵一樣曾參加東京的「福建學生會」與中國同

其次，包括校長〈弁言〉與三位作者的旅行記，都有清楚的福建與臺灣或中國與日本的比較意識，透過閩政落後與臺灣進步的對比，強調應該學習日本在臺的實業（尤其農業）知識，來改善福建的實業與農業發展。尤其邱文鸞的比較話語最為沉痛，諸如指出：「吾國農業尚在幼稚，雖有一二農業機關，不過懸一空名而已、不過多一糜費而已，至實際毫無裨益。」「惟吾國則否；嘗藉會社之名而為個人斂財之地，至事業成敗，置之不理。甚至旋起旋滅，空投巨資於烏有。此吾國民之所以無投資信用，亦實業不能發達之一大原因也。」

「其在臺灣，凡為總督管轄，無論官吏及學校教員皆服制服、佩短劍，衣冠皆有徽章。其出入一如常人，以視吾國官吏之前呼後擁、作福作威者，其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日本政黨競爭固激烈，然能互相監督，使不越政黨範圍之外……故在位者，不敢妄為徇私：此日本之所以能得政黨之助也。吾國政黨如何？只知分門別戶而已。」⁵⁰

其三，三位學生都有清楚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對當時正在發生的二十一條事件等中日外交糾紛，表示了強烈的憤滿情緒；也對於袁世凱稱帝的改變國體舉動強烈反對。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旅行記中顯示參訪的學生老師都對總督府的盡心招待與導覽感到非常滿意，但仍表露對於日本侵略與欺凌中國的強烈不滿。顯然對他們來說，儘管日本的實業知識必須學習，但並不接受總督府相關官員一再表述的中日親善的說法。⁵¹另外，他們雖然感佩日本對於臺灣的建設成就，但也清楚總督府對於臺人的同化教育與差別歧視政策。⁵²

盟會，並與福建菁英林森、方聲濤有密切關係。林熊徵學田基金會編，〈林熊徵先生傳〉，林熊徵學田基金會網站，<http://www.ta-yung.com.tw/index.html>（2016年10月15日檢索）。林進發，〈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頁136。張子文等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708-709。

⁵⁰ 邱文鸞，〈臺灣旅行記（一）〉，收入《臺灣旅行記》，頁2-5。

⁵¹ 如邱文鸞對日本官員的中日與臺閩親善說詞，就提出質疑：「細察其言，所謂聯絡工商業者，無非欲吾人售用日貨而已。中、日既屬友邦，安忍肆意凌虐！遠者不足責，即今年五月之無理要求，豈友邦當然之事乎？」邱文鸞，〈臺灣旅行記（一）〉，收入《臺灣旅行記》，頁18。

⁵² 如邱文鸞提到：「惟日人能養之，故雖橫徵暴斂而臺民不怨。且全臺之大，未見有一乞丐者，未嘗不歎日人經營臺灣之善也。總之，日人治臺如英治印度、法治安南，使其永淪於奴隸之籍而不自覺也。今之滅人國者如此，可不懼哉？」邱文鸞，〈臺灣旅行記（一）〉，收入《臺灣旅行記》，頁4。劉範徵則提到：「臺灣學校林立……學校之中日講忠君、日講愛國，蓋以為日本政府也，非為臺灣同胞也。」劉範徵，〈臺灣旅行記（二）〉，收入《臺灣旅行記》，頁58。

(四) 福建省教育科與實業科的臺灣實業考察

我們接著討論 1916 年 4-5 月間，在總督府的積極邀請下，福建巡按使許世英委派福建省教育科長兼實業科長汪洋與實業科科員張遵旭來臺參觀「始政二十周年臺灣勸業博覽會」，並進行臺灣考察的活動。⁵³汪洋與張遵旭等人，⁵⁴4 月 5 日凌晨三時抵達基隆港，總督府諸多官員在港口迎接。其後十餘日在臺北與總督府總督等官員會面、參觀各機關與共進會展覽，並到臺中、嘉義、臺南、打狗等處參觀各地實業機關。⁵⁵

考察團在臺期間，頻繁接受林熊徵與林鶴壽、辜顯榮等臺北豪紳的宴飲招待，同席的還有分別來臺的泉州鹽務局長何崧齡、廈門鹽務總局副局長徐模以及許多日本高階官員。⁵⁶在中南部期間，也常與中南部臺灣商紳會面晤談宴

⁵³ 應注意的是，此次博覽會不僅有以下詳述的福建省官方代表的積極參與，另外北京政府派遣農商部僉事廖世綸和高近宸等代表出席，江蘇省公署代表王樹榛等官員也來臺參考察，同時閩南出身的南支南洋僑商、漳泉廈門等地的商人與臺商也組成大規模觀光團來臺參觀。有關廖世綸、高近宸等人的參觀，參見〈支那政府派遣官〉，《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王樹榛參觀活動，參見江蘇省長公署實業科編，《參觀臺灣勸業共進會報告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閩南僑商、本地商人與臺商的參觀團，參見〈南支南洋觀光團招待會〉，《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4 月 29 日，第 6 版。另有關於此次勸業博覽會的活動內容，參見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編，《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報告書》（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有關福建官方代表汪洋、張遵旭等人的參訪活動，呂紹理與賴恆毅都曾為文分析，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頁 236-238。賴恆毅，〈臺灣的行旅經驗及其文化意涵——以「臺灣勸業共進會」相關記錄為例〉，《實踐博雅學報》，期 14，頁 89-113。但他們並不清楚總督府當時對福建官方南進政策的具體目標，以及福建官方經建學臺灣的目標，因此分析上仍有未盡之處。兩人都誤以為張遵旭對於展覽的心得，是被總督府的殖產興業展示與宣傳所「洗腦」了，但其實張遵旭等人來參展並不併參觀各種農業與經建設施，本來就是抱持著考察學習的目標，與被宣傳誤導或者缺乏警覺其實無關。

⁵⁴ 汪洋，安徽旋德人，時任福建省教育科長兼實業科長。南社社員，曾主編《東三省日報》、《中華民報》。教育背景不明，但熟知日本學知。有研究指出：「1910 年 3 月，《盛京時報》和《東三省日報》……發起『遊東（洋）考察政學農共商觀光團』，組成以《東三省日報》主筆汪洋為團長的東三省赴日觀光團……考察了商品陳列館、大學和專門學校，報社、博物館、動物園、工廠、監獄、美術館和銀行等，收穫頗多。」參見〈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2016 年第 2 期（總期 17），<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607/c383527-28418999.html>（2016 年 10 月 15 日檢索）。張遵旭，直隸南皮人，時任福建省實業科實業科員，出身學歷也不明，但他能看懂東京畫報，顯示應識日文。

⁵⁵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69-96。

⁵⁶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71-72。

飲。17-19日回臺北期間，則多次與暨南局總理林輅存帶領的福州觀光團諸君會面宴飲。⁵⁷另外洪禮修這段期間也曾回臺灣參觀共進會，並與張遵旭一行和福州觀光團一起搭船回福州。⁵⁸

兩人參訪期間，臺灣總督與汪洋等人儘管都很清楚兩方經濟的競爭性，以及對方的自利動機，但也都同意經濟交流的互利性。4月6日福建代表們與總督安東貞美談話，安東貞美即表達了一貫的親善說法：「臺灣與福建有特別之關係，兩國人須時相往來；諸君此行，極為歡迎，尙望以後常臨敝地，可以互相增長見識，疏通意見云云。」⁵⁹而18日在共進會的開會式上，廈門道道尹汪守珍所派代表林培堃代讀祝辭曰：「臺廈兩地，一水盈盈。航海相望，商賈咸征。翕維臺北，商務勃興。開會勸業，苦心經營。會名共進，貨集大成。九市通達，陳列縱橫。互相比較，益生競爭。……屬在比鄰，與有光榮。」⁶⁰

接著，我們分從張遵旭與汪洋兩人參訪後留下的報告資料，進一步分析這個考察的歷史意義。首先是張遵旭參訪後撰寫的〈臺灣遊記〉一文。從該文中，可明白得知福建官方此行有著福建經建學臺灣的意圖，如同其他許世英委派的考察活動一樣。如張遵旭等人與辜顯榮會談時，即曰：「談及我國當此歐戰千古未遇之時機猶不能發展海外貿易，振興內地產業，發達國民經濟，殊屬可惜。予等詢問我國商人目下情形若何。據言一無保護，又無機關，能力資本盡附缺如，將漸次消滅矣。」⁶¹參觀臺中時則說：「地質肥沃，物產豐富，甲於全島，米糖尤為大宗。其他如果實、林投樹、畜產、水產暨其他各種林業，皆日趨發達。檢其統計之數，逐年增加。此固由於天然之美利，然非國民之毅力經營，計畫深遠，曷克臻此。回顧我國寶藏山積，而國民蟄伏於多年腐敗政治之下，隱忍苟活，不識時局之變遷、大勢之趨向，坐棄厚利，良可嘆也！」⁶²

⁵⁷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94-95。

⁵⁸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96。

⁵⁹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71。

⁶⁰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95。

⁶¹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74。

⁶²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80。

另外參觀物產陳列所，發現過去日本每年從廣東進口約 200 萬元的廣東草包蓆，日人移植臺灣成功日漸發達，張遵旭不禁感慨：「我國人事事無人研究講求，坐失天然美利，殊可惜也！」⁶³參觀阿里山林業，則感慨：「嘗聞閩省內地，巨材大木到處盡是，惜交通不便，無人經營，坐棄厚利，殊為惋惜！」⁶⁴參觀嘉義血清作業所，瞭解臺灣獸疫預防的良好成績，則曰「吾鄉夏秋之交，亦時有獸疫發生（如牛疫、雞疫），奈鄉人不諳預防之法，官府又不為之講求，鄉民或感於迷信，坐任蔓延，聽諸天命，以致農業經濟上之損失，其數目以億萬計，不過無精詳統計，世鮮知耳。」⁶⁵

但同時也該清楚看到，張遵旭等人並非沒有民族主義的意識，他在參觀臺灣博物館看到樓上懸掛的「漢文大清國讓渡臺灣全島於日本條約原文」，即說：「外人視之以為莫大之光榮，吾人見之不覺潛然涕出也！」且在參觀各地臺灣歷史古蹟，不時表露對臺灣割讓給日本的痛惜之感，並在與臺人宴飲酬酢時，提及：「故國遺民之感，不禁交縈於腦中。舉座無言，默默相對，似各有無限感傷者！」遊記中更提及，嘉義商紳座談中有臺人某君對汪洋曰：「同胞無限感，盡在不言中。」⁶⁶又提到在阿侯廳車站本地人來看他們：「環視予等，互相稱道，似以中國人到此地，甚為罕見。默揣其意，又似於吾等有無窮之希望也。」並附記曰：「蓋自割臺後，內地人與臺灣人幾斷絕關係。中國固未嘗特派官員來此慰問視察，即私人來此游歷者亦尠。故此次予等到此，傳聞各地紳民異常感動。予深盼政府日後時加注意，私人方面則宜組織團體，時來視察，彼此借鑑，獲益定非淺解。」⁶⁷

接著，討論同行汪洋的考察報告，其報告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臺灣視察報告書》，共有土地、林野、行政區劃、氣候、戶口、教育、社寺、裁判、員警、蕃務、監獄、農產、畜產、水產、礦產、工業、電氣、金融、貿易、鐵

⁶³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81。

⁶⁴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83。

⁶⁵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86。

⁶⁶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76、82、84。

⁶⁷ 張遵旭，〈臺灣遊記〉，收入《臺灣遊記》，頁 87-88。

道、道路、郵政、電報、電話、築港、財政、衛生、專賣、市區改正等 29 章的內容。附錄並有日本領臺後重要史表。⁶⁸

仔細閱讀發現，內容是參考總督府出版的《臺灣統治綜覽》類的書籍，與歷年《臺灣統計要覽》等統計書所整理出來的。⁶⁹因此整個內容是總督府重要施政的整理，並以明確的統計資料，來說明總督府歷年施政進展。汪洋基本上並未對於這些施政加諸任何評價，閱讀此書者都可明白認識到臺灣在總督府治理下的進步發達過程。應注意的是，如果參照汪洋此行考察的目的，就可知道這個調查報告並不是說其受到臺灣總督府宣傳的愚弄，撰寫了一本為總督府在臺施政的宣傳書，而是在於從學知交流學習的角度，希望透過這些施政經過與內容的整理，提供給福建官方施政的參考。

另外可以發現汪洋的視察報告與清朝傳統方志並不一樣，而類似於臺灣總督府的各種福建調查，以近代性的實證調查和統計資料為主。兩者的差異毋寧在於兩者的對岸政策與調查目標的不同，臺灣這邊的福建調查是在南進政策的擴張侵略意圖下展開的，調查具有較多的主動性，調查中並對於福建省政的批判性意見，同時也提出日本推動南進應有的方略；與此相對，汪洋的調查較為被動，調查內容較受制於總督府資料的提供，除了教育上對總督府同化政策的少數批判外，缺乏對於臺灣各種經建政策的批判性看法，而僅是日本治臺成功經驗的整理。

視察報告的第二部分內容，則是在附錄中的〈臺遊日記〉一文。該文大部分記載行程包括與總督府官員、臺灣商紳的會談宴飲，以及具體的考察行程，內容多已在張遵旭的遊記中提及；同時，該文還包括他在交流過程的感想，不過基本上與張遵旭類似。

汪洋的感想，首先是對福建與臺灣經濟發展差異的比較，他提到廈門福州方面應臺灣總督府邀請提供參展的兩千餘件商品主要為「漆器、木器、磁器、

⁶⁸ 汪洋，《臺灣視察報告書》（臺北：成文出版社據 1916 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本影印，1985）。

⁶⁹ 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統治綜覽》（東京：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8）。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計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1911-1916）。

樂器、襪子、罐頭」，負責提供參展商品的福建代表們也提及這些商品大都是林熊徵與蔡法平兩人協助徵集的。汪洋並提到這些商品被置放於共進會第二會場的「南支南洋館」，「名為參攷，其目光所在，可以知矣」。他顯然知道透過與日本臺灣商品的比較，這些手工藝為主的商品所能收集到的目光為何。⁷⁰ 汪洋並未否定這些商品為福建的代表物產，但透過對比他亦知曉福建實業必須振興，否則物產不足以與他國商品「共進」。這些話語簡要透顯了他的心情與振興福建實業的急迫感。另外，他注意到參展中的臺灣各學校出品賣店係由臺灣工業講習所學生一手建築，因此感慨說：「明年本省開會〔閩侯農產共進會〕時，未審我工業學校土木科學生之感想如何？」⁷¹ 他顯然對福建實業教育與臺灣的差距感到憂心。

同時，與張遵旭一樣，他也懷有清楚的民族主義意識，不時感慨臺灣割讓給日本一事，因而在與臺人商紳會談宴飲時，分別賦詩：「故壘依然在，風吹綠滿山。海天飛隼急，江浦冷雲還。曲徑生芳草，離情憶玉關。鳥聲猶鳩舌，遺跡莫輕刪。」⁷² 「海外一樽酒，天涯諸兄弟，離懷不可說，應有故鄉情。」⁷³ 他對日本實施同化教育，令臺人忘卻與祖國關聯的歷史，有很深的感受：「予謂日人治臺，其他政策不足畏，此則其根本政策，再二十年以後，無人知歷史所從來矣。」⁷⁴

附錄〈臺遊日記〉最後，他提到 20 日抵達福州時，在港口與許世英等人相遇，許因當時中央政局混亂，剛決定辭掉福建巡按使職務，並準備乘船離開福州。許世英的離任也表示積極調查臺灣經驗與知識，準備改革福建省政計畫

⁷⁰ 汪洋，〈臺遊日記〉，《臺灣視察報告書》，頁 164-165。

⁷¹ 汪洋，〈臺遊日記〉，《臺灣視察報告書》，頁 168。這裡的明年本省開會，指福建省擬在隔年舉辦的「閩侯農產促進會」，表示此次參訪，也有為隔年該會籌備取經之意。但汪洋調查歸國後就隨著許世英一起離任，並未實際參與共進會的籌備。參〈農商總長田文烈呈大總統為查核福建省長咨閩侯縣知事王述曾等倡辦農產共進會異常出力請給本部獎章文〉，《政府公報》，號 809（1918 年 4 月 25 日），頁 13-14。

⁷² 汪洋，〈臺遊日記〉，《臺灣視察報告書》，頁 174。

⁷³ 汪洋，〈臺遊日記〉，《臺灣視察報告書》，頁 181。

⁷⁴ 汪洋，〈臺遊日記〉，《臺灣視察報告書》，頁 188。

的暫時中挫。儘管如此，汪洋這個視察報告，隔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成爲中國第一個有關臺灣殖民時期社會現狀的調查報告，對於當時中國學界政界的臺灣學知的流布，或中國應該學習日本學知進行政治改革的認識，應有一定的影響。

五、1917-1933 年間福建省政單位臺灣考察活動的分析

的確許世英 1916 年離任後，福建省政陷入嚴重的混亂，中央與福建的主政者都無暇進行積極的改革。不過，應該注意的是，許世英離任之後福建學習臺灣（日本）經驗與知識改革省政的步調雖然放緩，但並非完全停頓。

舉例來說，許世英任上借鑑臺灣考察經驗而提議開辦的「閩侯縣農產共進會」，還是在隔年正式舉辦了。依照政府公報公文，該會由閩侯縣知事王述曾倡辦，1917 年 3 月開始正式籌備，8 月開會、9 月閉會，共用會費 18,000 餘元，除由公款補助 4,500 元外，其餘由地方仕紳籌募。展品徵集自福建全省及國內外參考品，參觀人次號稱約 15 萬。⁷⁵1916 年臺灣勸業共進會的經費約 18 萬日圓（約合 18.23 萬銀元），參觀人數約 81 萬人。⁷⁶閩侯縣農產共進會雖然規模、經費與參觀人次都與臺灣勸業共進會無法相比，但對於福建的產業發展尤其農業改革來說，這一事業仍有其重要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實際籌備該會的籌備局局長正是前述提到曾來臺參訪的施景琛。而列名該會協贊會會長的是福建電氣公司的劉崇偉，他是留學日本的福州菁英，不但與其他福州留日菁英合力創辦當時福州最大近代化事業「福州電

⁷⁵ 參見〈農商總長田文烈呈大總統爲查核福建省長諮閩侯縣知事王述曾等倡辦農產共進會異常出力請給本部獎章文（附單）〉，《政府公報》，號 809，頁 13-14。

⁷⁶ 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編，《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報告書》，〈序言〉與頁 145。1916 年臺灣 100 日圓約合上海銀兩 70.9 兩，當時中國各地銀兩銀元比價並不穩定，此處以 1 銀元折合 0.7 兩計算。參見袁穎生，《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448，〈第二十八表日據時期臺灣銀行賣出之臺幣對上海市場我國貨幣匯價變動〉。

氣公司」，這間他與弟弟劉崇倫共同經營的公司，更在 1920 年代後期借鑑日本與臺灣的農業知識投入福建農業改革的事業。⁷⁷

而除了福州電氣公司之外，1917-1933 年間，福建省教育廳、福州農林中學與集美學校等教育機關，也曾陸續來臺灣進行一般教育與實業教育的視察，以下我們簡要討論這些考察活動。

（一）福建省教育廳的臺灣教育考察

曾留學日本回國後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侯鴻鑑，⁷⁸1917 年在擔任福建省教育廳視學期間，曾到臺灣考察教育，並撰寫了相關報告發表在提倡教育改良的刊物《教育雜誌》。他比較了臺灣與漳泉廈門的教育現狀，主張「對於漳泉廈門之教育而欲振興改進，厥道何由，曰惟有借鑑臺灣二十年來所以發達之由，而為漳泉廈門之效法計也。」

他提出了三個具體作法：廣設師範學校以造師資、分年推廣小學以期漸臻普及、增設實業學校以資應用。他並提到如果今日再不謀改進自強，則將無法消除日人對於福建的覬覦之心。並提到他曾與臺灣人討論臺灣教育狀況，對方也建議他把比較福建與臺灣教育的看法公開發表提供祖國參考；並提及原籍廈門的臺灣人有許多瞭解祖國的狀況與苦衷，願意協助祖國教育的灌輸改進，建議福建教育界同人應鼓勵臺灣人熱心協助漳泉廈門的教育事業。⁷⁹

在這之後，福建教育單位又組織了幾次臺灣教育考察的活動，首先是 1929 年福建教育廳督學孫承烈等三人奉廳令到臺灣考察教育。教育行程是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協助規劃，並以臺北為視察中心，以普通教育、師範教育、社會教育為考察目的。考察期間是由前面一再提到的臺灣人蔡法平招待。考察報告主要介紹臺灣各級教育的建置，具體說明臺灣教育發達的情形。

⁷⁷ 劉崇偉是福州七大名門家族之一劉家成員，與其他幾個家族一樣，該家族成員在晚清到民初幾乎都留學日本，並在政、經與文化界扮演重要角色。

⁷⁸ 丁書娟、王璞，〈侯鴻鑑與中國近代教育〉，《教育文化論壇》，2014 年第 6 期，頁 17-22。

⁷⁹ 侯鴻鑑，〈臺灣教育與漳泉廈門教育考察記〉，《教育雜誌》，卷 9 號 4（1917 年 4 月），頁 29-31。

但與之前教育考察關注點不同的是，報告中部分提及臺灣同化教育的問題，以及日臺人間教育不平等的一些觀察。首先，提及日本雖然強調一視同仁、協力一致，但實際教育方法為「使日本兒童同化臺灣人，並作其模範，以養其為奴隸的服從的國民，是為日人在臺施行初等教育格外留意的地方。」並提及公學校教育內容，強調日語與忠君愛國，對於臺灣文化一概不知，更不用說祖國的情形。其次，提及高等教育的入學情況有明顯歧視臺灣人的狀況。⁸⁰

（二）福建農業學校與福州電氣公司的臺灣農業考察

在農政與農業教育方面，前文提到的福建最重要的農業學校為福建甲種農業學校，在 1916 年後仍持續派人到臺灣考察。前述擔任該校主任教員臺灣人洪禮修至少到 1921 年仍在該學校任教，該校校長於此年曾派任洪禮修回來臺灣考察農林事業。只可惜具體的考察內容與報告，現已無存。⁸¹

另外，我們注意到 1927 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控制福建並改組省政之後，福建的農政教育無論是官辦或者民間興辦學校都有進一步的發展。首先是 1927 年北伐軍入閩後成立的福建省教育改造委員會，對福州原有的省立學校進行改造與合併。福建省農林學校（即福建省立甲種農業學校 1923 年改名）與前述福建蠶校合併為福建省立第一高級中學第二分校。但一年後，為提倡、改進職業教育，省教育廳將省立第一高級中學第二分校改稱為福建省立福州農林中學。1933 年 8 月，按照教育部頒發的職業學校規程規定，該校改稱福建省立福州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並遷址北門外崇福寺。其次，1928 年 1 月，原由美國美以美教會捐助成立的福州協和師範中學校，因北伐後的收回教育權運動而被國人收回自辦，改名為福州私立協和中學，遷址福州西門外祭酒嶺，並開始兼設農林科。1933 年 8 月該校因附設有農科，也按省令改辦職業學校稱福州私立協和職業學校，專門辦理初、高級農科。⁸²

⁸⁰ 孫承烈，〈攷察台灣教育報告（附表）〉，《福建教育週刊》，期 40（1929 年 9 月），頁 3-18。

⁸¹ 〈致交涉員据省立甲種農校校長託洪禮修前往台灣調查農林事業一案請轉函日領代達台灣政府于該員到地後乞為介紹函〉，《福建教育行政月刊》，卷 2 期 2（1921 年 2 月），頁 47。

⁸² 參見〈福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沿革〉，福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網頁，http://www.fjny.edu.cn/old/new/news_view.asp?newsid=794（2016 年 10 月 15 日檢索）。

福州農林中學附設農業試驗場場長林汶民等人，曾在 1929 年前來臺灣考察農林產業，並將考察經過發表在學校新發行的農學刊物《農話》上。與之前幾次福建官員範圍廣泛的臺灣考察相比，林汶民等農業專家的考察僅著眼在農政調查上。報告的第一部分，討論臺灣在中央與地方州郡的農業行政機關，即總督府殖產局與各州廳的勸業課和庶務課，並詳細說明各自的執掌。同時也描繪了臺灣協助農業行政的各農業團體，包括農會、業佃會、農事實行組合等，詳細說明其組織方式。

第二部分說明農業研究機關，包括在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詳細說明其分散各地的龐大農業試驗組織，同時也說明在各州立農事試驗場和州廳農會農場。第三部分，說明教育機關，包括實業補習學校、實業學校、高等農林教育、大學教育等。第四部分，則詳細列出了十八點考察心得，提供福建農政改革參考。最後則附錄臺灣重要的農政統計資料。⁸³

而臺灣農業知識與福建之間的交流，除了以上的農政調查外，還包括農業技術的借鑑，如同為福州農林學校教員的劉柏慶，在 1931 年初翻譯了一篇文章〈龍眼之種子並其發芽生育調查〉，就是譯自臺北帝國大學臺籍農業專家黃德增的文章。⁸⁴另應注意的是，這些調查經驗被應用在福建省政府於閩侯縣展開的農政試驗改革計畫上。⁸⁵此外我們也發現，福州農林中學升格，與福建省農業高等教育或者農會等機構的創設，都與同時期國民政府農會法的通過，並與中央政府對於農業行政與教育的擴充要求有關，不全是福建省政的自行開展，但地方籌措財源正式設立確有貢獻。

⁸³ 林汶民、劉柏慶，〈考察台灣農林蠶之經過（附表）〉，《農話》，卷 1 期 22-25 合刊（1929 年 9 月），頁 9-53。另有一篇討論蠶業的考察報告，林汶民、劉柏慶，〈台灣蠶業大觀〉，《農話》，卷 1 期 16（1929 年 6 月），頁 1-7。

⁸⁴ 黃德增，〈龍眼及番荔枝の種子並其發芽生育調查（第一報）〉，《林學季報》，卷 2 號 4（1930 年 10 月），頁 22-30。劉柏慶譯，〈龍眼之種子並其發芽生育調查〉，《農話》，卷 3 期 3（1931 年 2 月），頁 2-8。日文原文與中譯文時間差僅 3 個多月，可見福建農學專家密切關注臺灣農業學知。

⁸⁵ 劉柏慶，〈閩侯縣政府建設計劃（續）〉，《農話旬刊》，期 7（1929 年 3 月 1 日），第 2 版；劉柏慶，〈閩侯縣政府建設計劃（續）〉，《農話旬刊》，期 8（1929 年 3 月 21 日），第 2 版。

另應注意的是，此時期福建地區的農業知識研究與報導，大都刊登在福州農林中學在 1929 年開始發行的《農話》這個福建第一份農業刊物，該刊在福建地區近代農業知識的傳播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⁸⁶同時我們也發現福州農林中學雖然只是中等農學校，但在該校任教的除了前面林汶民、劉柏慶都具有留日背景外，徐紹華、陳振鐸這兩位留學日本的農業專家也在該校任職，並在其後設立的福建協和大學農學院與省立福建農學院等校任教，大力推動福建高等農業教育。

接著，討論福州電氣公司在福建農業近代化上的參與。接替兄長劉崇偉主導福州電氣公司經營的劉崇倫，為擴大福州地區農村用電量，希望向農村推廣電力灌溉，乃在 1926 年率領技師孫世華、趙仕安赴東京、臺灣實地參觀新式電氣化農場，回國後著手擬訂大規模推廣計畫，但因逢公司工潮而暫擱。

1928 公司業務日趨萎縮，開闢用電門路成為當務之急。乃在福建省省長支持下，在公司內設農村電化部，劉崇倫自任部長，制訂農村電氣化計畫，先期在閩侯縣科貢鄉創辦科貢農場和石倉農場，設水稻、園藝、牧畜、昆蟲 4 個部門，從事研究推廣使用電力排灌和科學養畜，進行農業生產改良試驗。1931 年劉崇倫更撰文〈福州電氣公司農村電化部之庶績〉刊載於《中行月刊》，以傳播其主張。其利用電力發展農村經濟，全省首創，被全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所推崇，亦為全國電氣行業人士所注目。⁸⁷

（三）集美商業、水產與農業學校的臺灣實業考察

1920 年代福建實業教育的進展，除了前述省會福州的官辦與基督教會民辦學校外，重要的還有閩南籍的南洋僑商陳嘉庚在故鄉廈門集美地區創辦的集美商業、水產與農業學校。

⁸⁶ 該刊 1929 年 1 月創刊於福州，停刊於 1933 年 4 月。

⁸⁷ 台江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台江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第二十七篇 第一章人物傳記〉，頁 861-862。關於該公司農村電氣化的業績，梁定蜀，〈福州電氣公司農村電化部事業概況〉，《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號 9（1934 年 2 月），頁 45-51。

陳嘉庚在 1921 年創辦廈門大學之前，1918 年就先創設了集美師範學校，包含師範科、中學與小學等。1920 年改校名為私立集美學校，並進一步在該校創辦了商科與水產科，招收高小畢業生入學，學制四年，待遇優厚，各費均免。隔年商科水產科合併，稱集美學校實業部。1924 年各自獨立為集美學校商業部與水產部。1925 年，水產部改稱為集美學校高級水產航海部，招收初中肄業生入學，學制五年，漁航兼學。1927 年水產航海部獨立成校，定名為私立集美水產航海學校。1932 年秋，改招收初中畢業生，學制三年。另外，1927 年級商業部獨立後成立的私立集美商業職業學校，也在 1933 年增辦高級商科，男女學生兼收，學制三年。此外，除了商業與水產教育外，1926 年陳嘉庚也擴建南洋華僑中學校舍，創辦集美農業職業學校，設置農林科推動福建的農林教育。⁸⁸

依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集美學校設立後陸續進行了多次的臺灣實業教育考察。首先，集美學校水產科設立當年就派教師來臺調查水產。1922 年 4 月間，該校又致函臺灣總督府，請求安排臺灣漁業行政與漁業者協助該校師生見習臺灣的進步漁法與漁具。並在 6 月間派遣水產科老師與第三學年生共二十名來臺數星期，見習迴轉式漁船、捕鯨漁船、發動機漁船等之操作。⁸⁹

其後集美水產航海學校校長教師水產科學生與集美中學畢業生共 33 人，1929 年 6 月間再度組團赴臺參觀實習，參觀場所包括全臺各地的製糖廠、製鹽廠、製紙廠、製罐廠、製冰廠、冷藏庫、魚市場、水族館、養殖場、水產試驗場、農事試驗場、測候所、電氣會社、水產會社、漁業會社、造船所、鐵工

⁸⁸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水產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第八章教育與科技 第一節機構〉，頁 204-205；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商業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七章教育 第一節普通教育〉，頁 541。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農業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七章教育與科研 第二節中等教育〉，頁 327。

⁸⁹ 〈支那學生の本島水產調査 近く來臺の豫定〉，《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4 月 15 日，第 7 版；〈本島水產視察談〉，《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7 月 3 日，第 3 版。但另應注意的是，在 1919 年集美師範學校剛創立時，當時的校長陳敬賢（陳嘉庚之弟）就曾經夥同廈門教會人士來臺視察製粉與製糖工場。〈廈人來臺視察〉，《臺灣日日新報》，1919 年 3 月 10 日，第 5 版。

場，以及政府之造林築港等等。此外兩週參觀結束後，水產生 7 名與指導員 2 名，繼續留在臺灣進行兩週的拖網漁業實習後方歸國。⁹⁰

其次，集美商業學校部分，1926 年 11 月到 12 月間，陸續有好幾組（每組近二十名）的商業部學生，也在教師夏守思的引導下，來臺灣全島各地考察數星期，考察地點包括各地的市街、銀行、會社、組合、產物館與一般交通機關等。⁹¹最後是集美農業學校部分，1927 年間，集美農業學校學生一行 30 名，由教師殷龍弼、章守玉二氏帶隊來臺灣視察，觀摩學習近代農林知識。⁹²

六、結 論

過去日本與兩岸學界對於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脈絡作了細緻的討論，尤其針對日本如何透過其文化、新聞與醫院設置等制度，來擴大日本在福建勢力與培植親日氛圍，作了詳盡的討論；同時對於臺灣籍民在福建的活動，也作了豐富的討論。但筆者發現相關討論中，尚未仔細討論福建官方對於南進政策的具體回應，或者對於福建省政的推展是否有哪些影響，尤其是沒有分析南進政策 / 臺灣籍民與晚清以來福建官方豐富的臺灣調查與考察活動的關聯，留下些可供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另一方面，就福建的臺灣考察活動的議題來說，雖然有些學者已經做過分析，但本文發現其僅針對考察活動內容作文本分析，而未能就考察活動產生的深層脈絡作分析。本文認為在分析這些臺灣考察活動時，應該關照到三個面向，首先是南進政策的脈絡，了解總督府在這些考察活動中的態度與角色；其次，則是應注意晚清民初福建主政者與地方菁英對於閩政改革的想法，以及在

⁹⁰ 福建省檔案館、廈門市檔案館編，《閩臺關係檔案資料》（廈門：鷺江出版，1993），頁 734-735。
〈集美水產航海學校生徒來臺〉，《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6 月 4 日，第 1 版。

⁹¹ 〈福建集美商科生來臺參觀〉，《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1 月 25 日，第 4 版；〈廈門集美商科生歸去〉，《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2 月 5 日，第 4 版；〈高雄 中華學生來〉，《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2 月 13 日，第 4 版。

⁹² 〈集美農生來嘉〉，《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1 月 26 日，第 4 版；〈諸羅 農生講演〉，《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1 月 29 日，第 4 版。

閩政改革中臺灣（日本）學知的角色；最後，應細究在這些考察活動的背後，臺灣籍民扮演的重要中介與網絡角色。

本文因此發現戰前臺灣與福建關係中，經建調查與教育考察活動中調查知識的互動交流相當重要，雙方並發展出相互為用且同床異夢的兩岸關係。我們發現南進政策下，帶著擴張侵略意圖的臺灣總督府不斷主動對福建官方發出臺灣考察的橄欖枝；或在福建官方主動提出考察要求時，盡心盡力殷勤招待這些考察成員，不僅希望建立中日親善關係，更希望能夠展開經濟開發上的合作，以便擴展日本帝國在福建政經與文化領域的勢力。

與此相對，福建省政官員儘管清楚日方與總督府擴展侵略意圖，但面對閩政困頓現狀不得不借鑑日本治臺經驗，因此有時被動回應邀請，有時主動提出考察計畫，前來臺灣考察希望取得臺灣知識並應用在福建省政上。最後，我們也發現被拉扯在總督府與福建省政府間，有著複雜政治認同以及自身利益考量的臺灣籍民菁英，在這數十年間，其實也不斷地參與中介著兩岸政府之間的這些經濟調查交流活動。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件名：省立甲種農業學校續聘大森四郎為教員抄送合同諮請備案〉，《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8/e7/90.html>（2016年10月23日檢索）。
- 〈致交涉員据省立甲種農校校長託洪禮修前往台灣調查農林事業一案請轉函日領代達台灣政府于該員到地後乞為介紹函〉，《福建教育行政月刊》，卷2期2，1921年2月，頁47。
- 〈農商總長田文烈呈大總統為查核福建省長諮閩侯縣知事王述曾等倡辦農產共進會異常出力請給本部獎章文（附單）〉，《政府公報》，號809，1918年4月25日，頁13-14。
- 《臺灣日日新報》，1916、1919、1922、1926、1927、1929。
- 侯鴻鑾，〈臺灣教育與漳泉廈門教育考察記〉《教育雜誌》，卷9號4，1917年4月，頁29-31。
- 江蘇省長公署實業科編，《參觀臺灣勸業共進會報告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
- 外務省通商局編，《福建事情》，東京：啓成社，1917。
- 汪洋，《臺灣視察報告書》，臺北：成文出版社據191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本影印，1985。
- 林汶民、劉柏慶，〈台灣蠶業大觀〉，《農話》，卷1期16，1929年6月，頁1-7。
- 林汶民、劉柏慶，〈考察台灣農林蠶之經過（附表）〉，《農話》，卷1期22-25合刊，1929年9月，頁9-53。
- 林進發，《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
- 孫承烈，〈攷察台灣教育報告（附表）〉，《福建教育週刊》，期40，1929年9月，頁3-18。
- 梁定蜀，〈福州電氣公司農村電化部事業概況〉，《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號9，1934年2月，頁45-51。
- 許世英，《治閩公牘》，下冊，未出版。
- 程家穎，《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臺灣圖書館日治圖書全文影像系統掃描檔，<http://stfb.nt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tgJLs/search>（2016年10月15日檢索）。
- 黃德增，〈龍眼及番荔枝の種子並其發芽生育調查（第一報）〉，《林學季報》，卷2號4，1930年10月，頁22-30。
- 黃德增，劉柏慶譯，〈龍眼之種子並其發芽生育調查〉，《農話》，卷3期3，1931年2月，頁2-8。
- 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廈門市志》，冊5，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
-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水產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商業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 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志·農業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 福建省檔案館等編，《閩臺關係檔案》，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
- 台江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台江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遊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旅行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計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1911-1916。
- 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編，《臺灣統治綜覽》，東京：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08。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福建省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1。
- 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編，《臺灣勸業共進會協贊會報告書》，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
- 劉柏慶，〈閩侯縣政府建設計劃（續）〉，《農話旬刊》，期7，1929年3月1日，第2版。
- 劉柏慶，〈閩侯縣政府建設計劃（續）〉，《農話旬刊》，期8，1929年3月21日，第2版。
-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

二、專著

-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臺灣》，板橋：稻鄉出版社，2002。
- 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
- 市川信愛等編，《近代旅日華僑與東亞沿海地區交易圈》，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
- 末廣昭編，《「帝国」日本の学知：第六卷 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2006。
- 任達（Douglas R·Reynolds）著，李仲賢譯，《新改革與日本：中國，1898-191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 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東至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許世英》，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
- 朱德蘭，《長崎華商貿易の史的研究》，東京：芙蓉書房，1997。
- 吳文星編，《鹿港鎮志 人物篇》，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
-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
- 角山榮編，《日本領事報告の研究》，東京：同文館，1986。
- 服部龍二，《広田弘毅：「悲劇の宰相」の実像》，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8。
- 施懿琳等著，《臺閩文化概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3。
-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滿鉄調査部・東亜研究所・IPR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84。
- 張子文等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
-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4。
- 梁華璜，《梁華璜教授台灣史論文集》，板橋：稻鄉出版社，2007。
- 梁華璜，《台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
- 笹川裕史，《中華民國期農村土地行政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
- 許世英口述，冷楓撰記，《許世英回憶錄》，臺北：人間世月刊社，1966。
- 袁穎生，《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 陳小沖，《日據時期臺灣與大陸關係史研究（1895-1945）》，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 湯洪潮編，《民國福建省地方政權機構沿革資料（1911-1949）》，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 黃伯度編，《許世英先生紀念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
-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 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劉海峰、莊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 嚴如平、賀淵，《陳儀全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三、論文及網路專文

- 〈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2期（總期17），<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0607/c383527-28418999.html>（2016年10月15日檢索）。
- 〈福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沿革〉，福建農業職業技術學院沿革網頁，http://www.fjny.edu.cn/old/new/news_view.asp?newsid=794（2016年10月15日檢索）。
- 丁書娟、王璞，〈侯鴻鑾與中國近代教育〉，《教育文化論壇》，2014年第6期，頁17-22。
- 佚名，《福州名人傳》，網頁 <http://www.nanchens.com/gdjj/gdjj01/gdjj01038.htm>（2016年10月21日檢索）。
- 李啓宇，〈「天風海濤」的題寫者許世英〉，刊於網站廈門數字文化館聯合網，http://www.xmwhg.com.cn/llyj/qwlllyj/mryxm/201607/t20160707_40923.htm（2016年10月15日檢索）。
- 汪毅夫，〈臺灣遊記裡的臺灣社會舊影：讀日據臺灣時期的三種臺灣遊記〉，《閩臺歷史社會與民俗文化》，廈門：鷺江出版社，2000，頁10-20。
- 松浦章，〈清末民国初期的福建省海外移民事情〉，收入藤善真澄編，《中国華東・華南地区と日本の文化交流》，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2001，頁159-179。
- 秦詠英，〈民國時期的臺灣研究綜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92年第4期，頁60-66。
- 林文凱，〈同床異夢的兩岸關係：中日戰爭前夕臺灣與福建間的經濟建設與農業調查活動之交流（1934-1937）〉，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週二演講活動報告，2017年11月28日。
- 林星，〈博覽會視角下的近代閩臺交流〉，《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11-16。
- 林星，〈日據時期閩臺農業交流的概況及特點〉，《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12年第4期，頁103-109。
- 林靜，〈日據時期閩臺農業交流述評〉，「殖民主義與臺灣歷史學術研討會」，廈門：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等主辦，2016年11月5-7日。
- 林滿紅，〈臺灣資本與兩岸經貿關係（1895-1945）——臺商拓展外貿經驗之一重要篇章〉，收入宋光宇編，《臺灣經驗（一）：歷史經濟篇》，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67-139。
- 林熊徵學田基金會編，〈林熊徵先生傳〉，林熊徵學田基金會網站，<http://www.ta-yung.com.tw/index.html>（2016年10月15日檢索）。
- 施懿琳，〈林軅存〉，「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xcm.nmtl.gov.tw/twp/TWPAPP/ShowAuthorInfo.aspx?AID=1040>（2016年11月11日檢索）。

- 劉立強，〈神州盡舜堯 巾幗有英豪：深切懷念母親陳舜英〉，收入皇甫建偉、宋保明編著，《烽火巾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頁 144-151。
- 張先清、劉映珏，〈清末福建留日學生狀況探討〉，《福建史志》，1999 年第 1 期，頁 38-42。
- 黃新憲，〈日據時期的閩臺教育關係〉，《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卷 2 期 1，2000 年 1 月，頁 7-13。
- 黃嘉康，〈近代福建教育推手：陳寶琛與福建教育近代化事業〉，收入周佳榮、范永聰編，《東亞世界：政治·軍事·文化》，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 303-320。
- 黃慶法，〈廈門東亞書院籌辦始末〉，《教育評論》，2009 年第 2 期，頁 129-132。
- 黃慶法，〈福州東文學堂述論〉，《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 2 期，頁 75-81。
-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入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公司，2000，頁 105-181。
- 潘健，〈1930 年代福建「經建學臺灣」的三次考察〉，《閩臺文化交流》，2010 年第 3 期，頁 36-42。
- 鄭梓，〈1930 年代福建如何「經建學台灣」？——以日治時期兩份「台灣考察報告」為核心的初探〉，收入賴澤涵等編，《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頁 143-167。
- 橫井香織，〈柳生一義と台湾銀行の「南支南洋」調査〉，《東洋史訪》，號 11，2005 年 3 月，頁 35-47。
- 橫井香織，〈日本統治期の台湾におけるアジア調査——台湾総督官房調査課『南支那及南洋調査』の分析を中心に〉，《東アジア近代史》，號 11，2008 年 6 月，頁 34-66。
- 橫井香織，〈台湾銀行のアジア調査と営業拡大：明治後期から大正初期を中心に〉，《現代台湾研究》，號 37，2010 年 3 月，頁 26-46。
- 賴恆毅，〈臺灣的行旅經驗及其文化意涵——以「臺灣勸業共進會」相關記錄為例〉，《實踐博雅學報》，期 14，2010 年 7 月，頁 89-113。
- 薛宗耀，〈許世英遭參劾始末〉，「福州新聞網」，<http://culture.fznews.com.cn/minhaishenzhou/2014-8-11/2014811XSF3SHX9PO183345.shtml>（2016 年 10 月 15 日檢索）。
- 鍾淑敏，〈日治時期台灣人在廈門的活動及其相關問題（1895-1938）〉，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北：臺灣東華書局，2004，頁 399-452。
- 鍾淑敏，〈明治末期台湾総督府の対岸経営：「三五公司」の福建樟腦専売問題を中心に〉，《台湾史研究》（大阪），號 14，1997 年 10 月，頁 32-42。
- 鍾淑敏，〈總督府「南支南洋」政策之研究：以情報體系為中心〉，收入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頁 695-722。
-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期 34，2004 年 12 月，頁 149-194。
- 鍾淑敏，〈臺灣籍民與臺灣華僑〉，收入甘懷真、貴志俊彥、川島真編，《東亞視域中的國籍、移民與認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81-191。

Lessons from Japan's Governance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Fujian's Official Taiwan Surveys and Investigations, 1911-1933

Lin Wenkai^{*}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a series of official Fujian surveys and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s o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11 to 1933, highlighting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First, this article critiques current scholarship that has ignored relevant surveys and investigations and their contexts, which included Taiwan's southern expansion policy, Fujian's 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Taiwanese (gentry-merchants). Second, using a new research framework, this article revisits such well-known surveys and investigations as those of Shi Jingzhen (1911), Cheng Jiayu (1915),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Fujian Provincial Agricultural School (1915), Wang Yang and Zhang Zunxu (1916), and other neglected surveys and investigations.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Fujian's official Taiwan surveys and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were not only initiated by Fujian provincial officials. Taiwan's Southern Expansion policy and Taiwanese in Fuzhou and Xiamen also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se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also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ji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of Taiwan in these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 Taiwan's southern expansion policy, Fujian's 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urvey, educational investigation, exchange of knowledge

*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